



经籍会通

“吾家墨兵”喻自家藏书，总结了“因、益、通、互”四种整理保存图书的方法。
孙从添则把购求书籍誉为“最难事，亦最美事、最韵事、最乐事”，显然是乐此不疲了。

[明]胡应麟 等著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经籍会通

《经籍会通》是清乾隆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经学类书，旨在汇集经学文献，考订经义，为学者提供便利。全书共一百卷，分门别类，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代的经学著作和研究成果。

主编：王昶



经籍会通

外四种

书目书话丛书

〔明〕胡应麟 等撰

王 岚 点校
陈晓兰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经籍会通 (明)胡应麟等著;王岚、陈晓岚点校. 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1999.7

(书目书话丛书;1)

2008年5月重印

ISBN 978-7-5325-1191-2

I. 经... II. 胡... III. 陈... IV. Z126.274.8
籍-研究-中国-明代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1999)第01151号

责任编辑:里 功

封面设计:揽胜视觉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53号 100051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7.5印张 170千字

2008年7月北京第2版 2008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定价:30.00元

前 言

中国古代对图书的收集、保藏历来有传统，一方面是国家专门的藏书机构代代相传，不断扩大规模；另一方面是民间好书者层出不穷，从搜聚、校阅、编目、保管等各个环节，逐渐积累经验。

在唐、宋人的著述当中，有关公私藏书事实的记载，虽然零散，但为数不少；明人对藏书经验的总结，则更为集中、更为系统。如高濂的《遵生八笺·燕闲清赏笺》专门有“论藏书”一则，精辟地分析了宋、元刻本各自的特点，还对书估作伪的种种手段，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。尤其是胡应麟《经籍会通》（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卷一至四），从有关古代图籍的源流、类例、遗佚、见闻等四个方面，阐述了他对古籍聚散存亡、古代目录书分类的演变发展、古逸书的钩沉辨伪、书册制度的演变以及明代各地刻书优劣比较等的认识，已经开始将有关古籍版本学的一些理论加以系统化。该书征引广博，不乏真知灼见，对于古籍目录及版本之学的研讨，至今仍具启发和借鉴作用。比如他提出雕版印刷“肇自隋时、行于唐世、扩于五代、精于宋人”的看法，由于现在有了一些中国最早期的印刷品《梵文陀罗尼经咒》、《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》等的发现作佐证，所以有学者认为还是“值得认真考虑”的（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》1996年第6期潘吉星《论一九六六年韩国发现的印本〈陀罗尼经〉的刊行年代和地点》）。至于汇聚古人藏书事

迹、专门总结私人藏书方法的开先河之作，当推祁承燾的《澹生堂藏书训约》。

清朝，考据之学全盛，聚书、藏书、考校版本、编订目录，成了文人学士个个都喜欢做的事情。在清人的著述中，或继承明人遗绪，对藏书方法讨论得更为详尽周密，如孙从添《藏书记要》、叶德辉《藏书十约》；又有搜罗古今藏书家事迹，以诗系人，汇聚众多藏书史料的叶昌炽《藏书纪事诗》；还有改为以诗吟咏版本的杨守敬《藏书绝句》等等。最终则出现了清代版本学的里程碑之作叶德辉的《书林清话》，称引了丰富的材料，全面总结了对古籍版本研究的经验，取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。

藏书，就古书版本研究之学来说，只是其中一端，而古人讨论藏书问题，不外收聚、鉴定、保管、阅览几个环节。

关于收聚，古今藏书家都强调一个“好”字，其次才是“有力”。宋欧阳修《集古录序》云“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强”，而“力莫如好，好莫如一”，他就是以好而能一的精神去收集那些钟鼎彝器及拓片文字的。祁承燾认为只有“精神欲注”，书方能聚于所好，强调的是专一（《澹生堂藏书训约·藏书训略·购书》）。孙从添则把购求书籍誉为“最难事，亦最美事、最韵事、最乐事”，显然是乐此不疲了（《藏书记要·购求》）。

宋代郑樵在《通志·艺文略》中最早提出了“求书八法”。祁承燾又补充了“三巧”。他那种从后世引文当中辑集古逸书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，但是将原书与注文析而为二以增加图书种类的提法，却遭到后人讥评。

藏书家对古书鉴定向来非常重视，高濂在“论藏书”中，历数书贾变幻莫测的种种作伪手段，就是从鉴别晚出之书假冒宋、元本角度着眼的。胡应麟在《经籍会通》卷四中，将明代各地刻本的特点作了总结，揭示了古今刻本优劣之演变。祁承燾《藏书训略》专有《鉴书》一章，提出鉴书的原则在于“审轻重、辨真伪、

核名实、权缓急而别品类”。孙从添《藏书记要》第二则即为“鉴别”，强调其重要性，“夫藏书而不知鉴别，犹瞽之辨色，聋之听音”，分析了他所见的诸种宋本、元刻、明刻，甚至外国的高丽刻本的优劣特点，教导人们“择善而藏”。叶德辉《藏书十约·鉴别二》认为“鉴别之道，必先自通知目录始”，否则不知古书之存亡，“一切伪撰抄撮、张冠李戴之书，杂然滥收，淆乱耳目”，指明了勤考古今目录乃鉴定版本的基本途径。

藏书家们对于自己苦心孤诣收集得来的图书无不珍若拱璧，故而十分讲求保藏之道。在危害书籍的各种因素当中，有人为的以及自然的原因。胡应麟曾总结过历史上祖龙、新莽等八次“大厄之会”（《经籍会通》卷一），皆为朝代交替之际的兵燹之祸。宋李清照的《金石录后序》就曾形象生动地描述了靖康之难中，她与丈夫赵明诚一生积聚的金石、书画，是如何一批一批地损失殆尽的。而在自然因素中，水火无情、虫鼠肆虐，就成了图书的最大敌人，藏书家们也一直在谋划预防的良策，孙从添《藏书记要》、叶德辉《藏书十约》对此作了较多的探讨。比如避开卑湿之地，修建通风宽敞的高楼以防水防潮；以水制火，不携星火上楼，建石仓储书等等以防火厄。对付虫鼠啮蚀书本，一用药物杀虫灭鼠，一则定期曝书。孙从添提出在伏天用抬板晾晒，凉透入柜。叶德辉则认为南方宜选八九月秋高气清时曝书，方符合气候规律。

为保管图书、防止散失，藏书家的有效方法即是编制藏书目录。明清藏书家有许多都是精通目录、校勘、版本、考据之学的博通学者，他们珍视藏书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认真编订自己的藏书目录。清人私家书目、藏书记、题跋集多不胜数，且相当一部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，就是这一风气的体现。藏书家编制目录，首先重视分类的合理性，除了传统的七分法与四部分类，他们往往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胡应麟对目录之学深有研究，他利用诸史艺文志、诸家目录，考定出各代的图书数量，分析了古今各家

目录书的分类体例，品评其优劣得失，认为应该为“伪书”专立一类，尤其推崇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，而对郑樵《通志》有较多的批评（《经籍会通》卷一、二）。祁承燦在《藏书训略·鉴书》中提出古书分类应另立“理学、纂训、书记”等类，四部之后当附“杂纂”与“类书”，且认为史部别品类最难。孙从添提出藏书家应编四套目录：一、四部大总目录，二、宋元刻本、抄本目录，三、分类书柜目录，四、书房架上书籍目录等（《藏书记要·编目》）。叶德辉《藏书十约·陈列四》也讲了私家藏书编列书目的分类以及收贮方法。

而且清代藏书家大多重视校勘，孙从添认为“惟勤学好问隐居君子，方能为之”（《藏书记要·校讎》）；叶德辉更是强调“书不校勘，不如不读”，且校勘有“习静养心”等八大善处，只有将自己的校勘所得笔之题跋，“方为不负此书”（《藏书十约·校勘七、题跋八》）。所以清人所编藏书目录，并非简单地著录书名，而多是有详尽考校意见的版本解题目录，如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、黄丕烈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、丁丙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、莫友芝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等等，都深为后人称道。

不过，收藏图书并不是最终目的，因为书是供人阅读的，如果纯粹藏书而不懂得读书，那即使图书堆积如山，也不见得有什么价值。明王世贞曾言：“世有勤于聚而俭于读者，即所聚穷天下书，犹亡聚也；世有侈于读而俭于辞者，即所读穷天下书，犹亡读也。”胡应麟也强调“书好而弗力犹亡好，聚者之弗可无读也”，而他本人博学能文，深得王世贞赏识，称他为能聚、能读、能辞之人（《二酉山房记》），清朱彝尊亦赞其不失为读书种子。祁承燦在《澹生堂藏书训约》中，有《读书》、《聚书》二训，取古人好学嗜书之事迹编排而成，目的即在于训示子孙师法前人。清代传是楼主人徐乾学，也被黄宗羲称赞为能集藏书、读书、文章为一身之人，非其他藏书家可及（《藏书纪事诗》卷四）。

私人藏书作为私人财产，多半是传与子孙的，读者范围局限于子弟亲族，而且为了保证图书不致损坏散失，一般是不准外人借阅的。比如明代范钦天一阁的规训非常严格，凡阁橱锁钥分房掌之，禁以书下阁梯，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。祁承燾则与子孙们约定：“子孙取读者就堂检阅，阅竟即入架，不得入私室。亲友借观者，有副本则以应，无副本则以辞，正本不得出密园外。”但是世上图书聚而复散，散而复聚的情况又有多少，所以胡应麟明白“书好而聚，聚而必散，势也”，这个道理不必忌讳。清曹溶眼界颇宽，他明确指出，藏书家的责任，一方面是保存图书，而更重要的还在于使图书流通，提出一“节宴游玩好诸费，出未经刊布者，寿之枣梨”，二“有无相易，精工缮写”，并著《流通古书约》一卷，阐明其主张，在当时便得到了徐乾学、范钦等人的响应，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（《藏书纪事诗》卷四）。与此类似的还有丁雄飞《古欢社约》，是他与黄虞稷二人之间聚书共读的约定。另外鲍廷博深明“物无聚而不散”的道理，将家藏异本集中刊为《知不足斋丛书》，以家藏之秘公之天下，广为流传，实践了他的主张“吾将以散为聚耳”。在这方面有集中论述的，更有周永年的《儒藏说》。自古有佛藏、道藏，为佛家、道家典籍之总汇。明代曹学佺始倡儒藏之议，但未能实现。周永年则在此基础上加以阐明发挥，认为要使古今书籍传之久远，永无散失之虞，只有广建儒藏，将图籍公之天下。其《儒藏条约三则》还指出了建立儒藏的具体做法。后来他还将其主张付诸实践，与桂馥共筑借书园，延揽四方学人。当时参与讨论、共赞此议的还有李文藻、孔继涵、罗有高、刘音等。他们提出的看法其实就是关于建立公共图书馆的一些早期的思想，虽然朦胧但颇具意义。

中国古代私家藏书，宋以后有了很大的发展，尤其是经济、文化相对比较发达的江、浙一带，逐渐成为全国刻书、藏书业的中心地区，明清时期更是涌现出一大批知名的藏书家。清人洪亮吉

《北江诗话》卷三曾将同时代的藏书家分为考订、校讎、收藏、鉴赏、掠贩家五等，虽有不尽允当之处，但基本能够反映藏书家的不同类型。历代对于藏书家事迹、藏书事实、书林掌故的记载，零星地散见于各种公私目录、地方史志以及各家文集笔记。明祁承燾《澹生堂藏书训约》的《读书》、《聚书》二训中，摘录有古人好学嗜书的事迹，但是非常简单，且偶有次序颠倒、记述差谬之处，前人已有辨正（清张宗泰《鲁岩所学集》卷十一跋）。清嘉庆年间范锴据郑元庆《湖录》辑纂的《吴兴藏书录》，是第一部记述藏书家事实的著作。光绪年间杭州著名藏书家丁申修撰的《武林藏书录》，则汇集了历史上杭州地区采书、进书、刻书、藏书的丰富材料。稍后成书的有叶昌炽的《藏书纪事诗》，以诗系人，采摭众多史料，记录五代至清末藏书家 1100 余人，故有藏书家“诗史”之誉。随后，便有了一系列的续作、仿作，如徐信符的《广东藏书纪事诗》、伦明的《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》、王佩铮的《续藏书纪事诗》等。

总之，明清藏书家对古代典籍的保存整理作出了不小的贡献，他们总结的藏书经验，多为平生心得，足为后人借鉴师法；他们在论述各种版本学问题时征引了丰富的史料，又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众多的线索。上面提到的各种明清藏书家著述，本册书中共选录了六种，其作者生平以及此次点校的版本情况简介如下：

一、《经籍会通》四卷，明胡应麟（1551—1602）撰。胡氏字元瑞，一字明瑞，兰溪（今属浙江）人，明神宗万历四年（1576）举人，博学好辨，精目录考据之学，与杨慎、焦竑齐名。喜聚书，有二酉山房藏书甚富。在心学盛行的明代中叶，胡氏特立独行，钻研古学，考校疑义，一反空疏学风，颇为难能可贵。所著考证笔记《少室山房笔丛》汇集其平生考据杂说，分正、续二集，总四十八卷，收书十六种，《经籍会通》即其第一种。

此次以明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）江湛然金华郡斋刻本《少室

山房笔丛》为底本，参校影印清乾隆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（简称四库本）。1964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明万历本加句读重印，却与江湛然本有较大差异，当另有所本，故予以酌校。凡校记均出于当字之下，后五书同此。

二、《澹生堂藏书训约》四卷、《旷亭集》二卷，明祁承燾（1565—1628）撰。祁氏字尔光，号越凡、夷度、密士，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人，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）进士，历江西右参政，晚号旷翁，有《澹生堂集》。祁氏一生嗜书甚笃，且善于择书读书，精于鉴别，著《澹生堂藏书目》八卷（一本十四卷）行世。他不仅自己惜书护书，也希望子孙后代永保家风，其藏书章即曰“子孙永珍”。《澹生堂藏书训约》，前有约后有训，就是他与子孙订立的规约以及欲传示后人的经验之谈。其训分三部分：读书训、聚书训和藏书训略。藏书训略乃其精华所在，又分为购书训、鉴书训二节。《旷亭集》所收为作于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的《庚申整书小记》及《庚申整书例略》，以“吾家墨兵”喻自家藏书，总结了“因、益、通、互”四种整理保存图书的方法。祁氏一生嗜书如命，所叙藏书之道皆其毕生经验之谈，且从至情至性中流露出来，娓娓动人，极富艺术感染力。

《澹生堂藏书训约》最早有明刻本（今人郑振铎《劫中得书记》谓为万历四十四年刊本），前有郭子章等七人题序，为它书所未见，诸训次序亦与它本小异，首藏书训略，次读书训、聚书训，末附《旷亭集》二卷（此本郑振铎曾叹为秘籍，欲以重印而未果）。后清乾隆鲍廷博刻入《知不足斋丛书》第五集，诸训次序为读书、聚书、藏书，且无《旷亭集》；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缪荃孙刻入《藕香零拾》，亦如此。而《庚申整书小记》及《庚申整书例略》又见附于清光绪二十年徐友兰所刻《绍兴先正遗书》第三集所收的《澹生堂藏书目》卷首《藏书约》之后，与清康熙间宋萃漫堂抄本相同。今以明刻本（藏北京图书馆）为底本，卷首诸

人序仅保留郭子章一篇，诸训次序据众本调整为读书、聚书和藏书，参校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（简称知本）、《藕香零拾》本（简称藕本）以及清宋氏漫堂抄本（藏北京图书馆，简称漫本）、《绍兴先正遗书》本（简称绍本）。

三、《藏书记要》一卷，清孙从添撰。从添字庆增，号石芝（《中国藏书家考略》：一曰名庆增，字从添，一字石芝，见《藕香零拾》本缪荃孙跋），常熟（今属江苏）人，生活在乾隆时期。嗜书成癖，以“老蠹鱼”自诩，筑室曰“上善堂”，兼收藏、鉴赏二家。所记藏书之要共八则：购求、鉴别、抄录、校讎、装订、编目、收藏、曝书，概括了有关古书收集、整理、保管各个环节的操作方法，既全面又精要，亦皆甘苦之言，许多术语还为后世袭用，在中国早期图书馆学术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

此书前后刻过三次，今以清嘉庆十六年（1811）黄丕烈《士礼居黄氏丛书》本为底本，校以道光十三年（1833）杨复吉《昭代丛书》辛集别编本（简称昭本）、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缪荃孙《藕香零拾》本（简称藕本）。

四、《儒藏说》一卷，清周永年（1730—1791）著。永年字书昌，自称林汲山人，历城（今属山东）人，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）进士，为《四库全书》编修官。学问渊博，积书五万卷，为人颇谦，疏于著述且不存稿，所传《儒藏说》亦甚简括。今据民国七年（1918）吴昌绶《松邻丛书》甲编本点校。

五、《吴兴藏书录》一卷，清郑元庆撰，范锴辑，记载历史上吴兴即今浙江湖州一带的藏书家的书目及其事迹。郑元庆，字芷畦，归安（今浙江湖州）人。自幼通史传，覃思著述，与毛奇龄、朱彝尊等有交。家贫，寄迹幕府，后归而著述。康熙、雍正间荟萃吴兴之山川文献，编辑郡志，稿凡六易，成《湖录》一百二十卷，生平精力，殫于是书。范锴，初名音，字声山，乌程（今浙江湖州）人。嘉庆初从杨拙园处获见郑元庆手订《湖录》残本，假

归读之，见其中记载自南朝宋至明藏书家一二十家，并附益藏书事实，读而惊喜，又从《湖录》其余部分缀辑各家生平传略，汇钞一卷，题为《吴兴藏书记》。事见道光十年（1830）范锴序。此书是第一部专门记载藏书家事实的著作。书中引录大量书目、笔记、序跋、家乘材料，并有本人与著名学者的考见，对于研究历代藏书与藏书家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。如南宋著名藏书家陈振孙的事迹，以本书记载最为详尽。

此次以《范声山杂著》刻本为底本，参校归安姚慰祖晋石厂（庵）刻本（简称姚本），酌校嘉业堂刊本《湖录·经籍考》。

六、《武林藏书记》五卷，清丁申（？—1887）撰。丁申，字竹舟，钱塘（今浙江杭州）人，与其弟丁丙为八千卷楼的主人，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，时人称为“双丁”。光绪年间二人对于文澜阁散失图书的购求收藏，尤为有功。本书卷首叙述清乾隆间建造文澜阁以及光绪间修复的经过。卷上记载北宋以来杭州地区官方刻书、藏书、采书的大致情况，又述及南宋坊刻、书院藏书及清乾隆、嘉庆时的浙江进书。卷中、卷下记述自三国吴至清代杭州一地的藏书家，叙其生平及藏书事实。卷末记述历代侨寓杭州的藏书家的事迹，以及释道典籍的刊刻和聚散。丁申在版本、藏书方面具有广博的学识，于杭州的地方文献尤为谙熟。本书的修撰，正如丁申在自序中所说的“采公私目录，备古今掌故”，为历代版本、藏书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材料。今据清光绪庚子（1900）嘉惠堂刊本点校。

目 录

前言	(1)
经籍会通	[明] 胡应麟著 (1)
经籍会通引	(3)
一经籍会通	(5)
二经籍会通	(19)
三经籍会通	(33)
四经籍会通	(47)
澹生堂藏书训约	[明] 祁承燾著 (61)
祁尔光澹生堂藏书训约序	(63)
澹生堂藏书约	(65)
读书训序	(68)
聚书训序	(72)
藏书训略	(76)
附录：旷亭集	(86)
藏书记要	[清] 孙从添著 (93)
儒藏说	[清] 周永年著 (113)
吴兴藏书录	[清] 郑元庆著 范 锴辑 (121)
武林藏书录	[清] 丁 申著 (139)
武林藏书录卷首	(145)
武林藏书录卷上	(147)

目 录

武林藏书录卷中.....	(170)
武林藏书录卷下.....	(190)
武林藏书录卷末.....	(217)

经籍会通

[明] 胡应麟 著

王 岚 点校

